

氣候少年

Climate Generation

第
11期

2022年5月



準備迎接另一個「史上最高溫」的夏天？

守護水土林氣

綠色年代的美好時光

一枝筆為環境

人的今與昔

氣候行動家



愛的萬物論

地球日的懷想？

發行人的話

美好的環境需要新的語言

身體的調適與國家的調適

身體就是一個綜合的調適器，讓人的一生可以適應各種環境的挑戰，只是現在人們不但要經歷各種自然環境的變化，更多時候面對的是來自夾雜環境在內的社會經濟挑戰。台灣是屬於高度脆弱的國家，即使不刻意強調，但實質上每年面臨的自然環境挑戰不少，颱風、地震、土石流、洪水等。人要怎麼變得更有韌性？涉及到人的三觀，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同此道理，國家怎麼變成更韌性的國家？涉及到法治觀、自然觀、未來觀。

培養韌性的人生是最好的投資，而不是成本。國家也是。沒有法治的國家，不會有澄明的吏治；沒有自然觀的國家，不會成為可長可久的國家；沒有未來觀的國家，不會有茁壯的世代；脆弱性是變化多端的，當你以為自己是剛強的性格時，另一波無名的悲傷再度侵襲。

平等權是一種出生權？出生那一瞬間就是平等的基礎？還是根本是不平等的化身？天生不平等，社會制度淡化之、稀釋之、導正之、救濟之，於是不平等不會成為一個隱藏基因，不會成為一種循環倫理，更不會限縮自由意志。所以，社會制度不能成為不平等的孵化器，一切有不平等催化劑之可能的社會制度，就是邪惡的制度。為政（人）之道，在於洞察機微，不助紂為虐，不讓不平等成為個人與國家無法調適的烙印。

發行人：台灣小黃鼠狼

主編：寶島波眼蝶

作者：地球觀點

<http://www.eqpf.org>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謝英士

地球日的懷想

今年的地球日剛剛度過，沒有多少人關注這個攸關地球未來的節日，也少有人注意到其實戰爭與人權都是環境問題，都與環境息息相關。

就像當年美國環境運動—1970.4.22世界地球日的威斯康新州參議員 Gary Nelson，也沒有料想到為什麼一個超過2千萬人的集會遊行，就這樣在越戰與公民運動的同時出現。這是綠色年代的高峰，但曲線不是上升的，偶有下降的趨勢。

據說，在美國的環境運動中，最早開始的是漁民與獵人，那是攸關其生存與空間的所繫。在新興發展國家，環境運動通常沒有那麼自主性，也沒有奇遇（蹟），因為政治、公民、人權、甚至婦女等「第一代」政治運動是這些國家更迫切的問題，環境運動只能被夾帶，成為政治的附庸。許多概念、語彙都已經被盛行的威權、經濟、發展所壟斷，還沒有誕生「自然意識」的新移民與奮發向上的中小企業主，還無暇思考、推動跟環境相關的問題。

環境問題被窄化成管線末端的污染問題，環境問題更是事後發生制，發生問題再說的問題。

美國的地球日運動，帶來的立即影響是「環境法治」的建立，清淨空氣法、清淨水法、瀕危物種法等，都非常有前瞻性的展現在世人的面前，也給地球日世代的所有美國人一種難得的榮譽感。美國環保署甚至在地球日之後七個月就成立，效率驚人。



不像臺灣，即使大多數「政府機構」都已經改組完成，但「環境資源部」就是硬生生的停滯在「環保署」的層次，成為被遺漏的政府組改的最大遺珠，卻沒有在社會掀起多大的迴響與反彈。

相對於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地球日的「成功」，以及到了這個世紀20年代許多國家的「環境立法」不但沒有「進步」，甚至還有「退化」的現象，這到底是什麼因素造成的？政治力的吸納固然是主因，難道其中沒有公民教育的失敗或鈍化的影響？環境問題變得更政治性之後，妥協性更高了，但是環境品質、環境正義卻沒有得到更大的彰顯。

或許，政治上，環境主義有太多不現實的衝突，是政治失敗者，也因此，許多重大的法案，包括碳稅、碳交易、甚至氣候變遷法都無法闖關成功，徒留環境退步的問題。

也許問題是環境工作者自己過於漠視政治影響力，甚至假託給政治，卻不自己涉足其間？如果地球日像一個教育過程，環境組織或工作者，是不是要花更多時間思考如何與政治、企業對話？在這個各自為政、各有偏好的時代，還有這種「契機」嗎？政治是顯性的影響，教育則是「隱性」的影響，後者會是環境主義的未來嗎？

另一個地球日

官方訂立的世界地球日源自和平運動者John McConnell，1969年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環境會議（UNESCO Conference on the Environment）所提出，希望訂在每年春分（3月20日或3月21日），提醒世人和平及環境的重要。春分日夜等長，陽光普照各地，也象徵著平等。

1971年聯合國祕書長簽署地球日宣言（Earth Day Proclamation），約定在春分前後，3月21日 19:00（世界時）於聯合國紐約總部，敲響一枚來自日本學童捐獻硬幣所鑄鑄的和平鐘，為靜默反思的地球小時（Earth Hour）揭開序幕。

準備迎接另一個「史上最高溫」的夏天？

夏天很快就要到了，高溫的天氣會不會讓你想要更了解「氣候變遷」的故事？

也許「氣候變遷」這個名詞現在也變成了熱門，但也無能為力、莫可奈何的象徵。「氣候變遷」講了三十年，從年輕到步入中老年，從還沒出生，到而立之年，有些可以感受到，但對多數人而言，還以為日常就是這樣，跟以前差不多。

關於氣候系統的穩定，可能確實無法有一道明確的分界線，說這樣就太高，那樣還好。冬天的日子縮短，夏天的日子拉長，本來不怎麼敏感的人類身體，開始有了感覺。對季節敏感度高的作物，早就有了反應。動物更不用說了，可能正在醞釀集體智慧希望突破氣候的限制，找到適應的方法。

所謂氣候的影響，從無形到空氣、地表的土壤、河川與水流都毫無例外的體會到了，「人類世」概念的提出不是一種榮耀的勳章，反倒可能是人類的墓誌銘，如果這個警示作用還不能傳達一絲危機意識的話。

以前老布希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1988年），還曾戲謔的提出「以白宮效應對抗溫室效應」，那個時候的政客對氣候變遷的無知，甚至延續到三十年之後。聯合國2000年的千禧年倡議（MDG,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8個目標，很快到了2015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17個目標，「量化」更具體，「目標」更交叉，但是政客的決心卻難以透過這樣操作加以落實。



思維與視野停留在過去的許多人，都不相信氣候變遷科學，認為這是一個徹頭徹尾高昂的騙局。這些人不是「自然力量」的信仰者，而是「人類萬能」的支持者，有些更是懷抱不良動機的「資本利得者」。

科學家說，即使在二疊紀末，火山爆發所注入大氣的二氧化碳，導致大滅絕的那個時代，都沒有像現在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這個高。工業革命以來大量燃燒的各類化石燃料，讓我們的大氣二氧化碳濃度早就超過 410ppm，現在還以每年上升 2ppm的速度向前挺進。每一年所偵測到的歷史高溫，都在說明這個鐵一般的事實。

就像疫情擴散會限縮我們的生活空間與人際網絡一樣，氣候變暖也正在改變我們的生存空間，甚至精神世界。為了因應這個巨大的變化，溫度與濕度的調節顯得更加重要。

專家說，即使通風良好，當溫度高於35度，而濕度大於90度時，人的生命與健康將遭受極大的威脅。

當法律繼續將氣候變遷造成的各種風險視為不可抗力，將會進一步弱化、鈍化政府的應變作為與能力。而化石相關的產業，如果掩蓋其不利於氣候系統的「知識」，今日人類的命運或許也會有所不同。



2013年環品會環臺路跑路跑，活動T-shirt訴求大氣碳濃度 400ppm to much。沒想到不到幾年就超過警戒濃度，令人不勝唏噓

綠色年代的美好時光

在1964-1976這12年之間，美國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攜手在一連串的重要環境立法共同合作，像一幕又一幕「立法的榮光」，閃耀著光芒，可說是「環境」在人類的歷史上特有的尊嚴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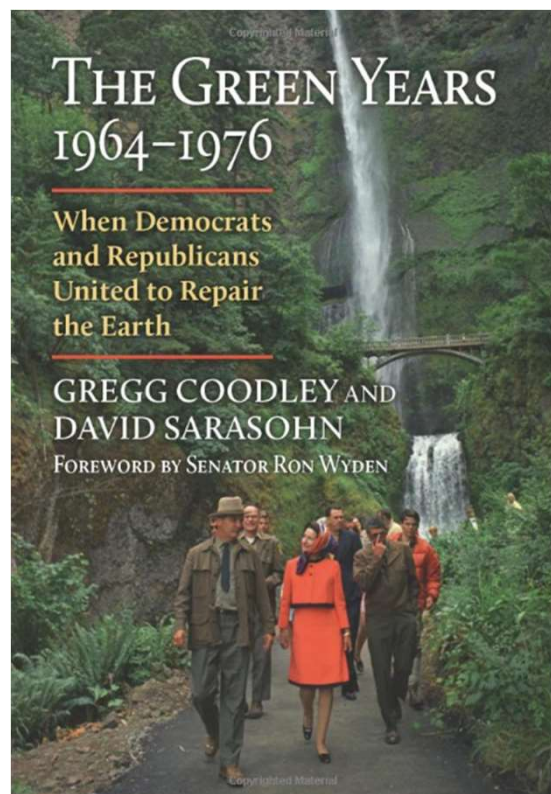
在Robert Gottlieb, Martin V. Melosi, Carolyn Merchant, Roderick Nash, Adam Rome, Paul Sutter等眾多歷史學者所做研究的基礎上：“1964-1976，當民主黨與共和黨團結修復地球”（The Green Years, 1964-1976: When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United to Repair the Earth）這本書，由Gregg Coodley跟 David Sarasohn共同著作，參議員 Ron Wyden寫序，呈現了一段環境法的美好時刻，而這正是由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的議員所共同打造。

在今日黨同伐異的時代，回顧這段歷史，除了具有警鐘之作用外，也不無借古鑑今的用心。作者Coodley是一位物理學家，而Sarasohn則是一位編輯。他們的貢獻是藉由堅強的史實，提醒美國人在過往的一段時期，美國人是如何的團結而非分裂，一起救地球。

至少美國還可以為環境而團結在一起，如果不是別的理由的話。想必臺灣在此時此刻，也更可以感受到這樣的張力。

1964-1976這段期間，幾乎所有環境立法都得到民主與共和兩黨跨黨派的支持通過的。作者梳理了從政治承諾到立法實踐的過程，例如1972年的清淨水法、1976年的有害物質管制法等。

而為什麼從1980年代開始，共和黨人開始滑出這條美好的天際線，不支持環境立法，深值反思，作者也容留許多空間加以探討。





1970年尼克森總統簽署國家環境政策法，奠定聯邦環境法治基礎©NEPA

作者認為，從1960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尼克森總統並不是個人對環境議題情有獨鍾，他身邊有許多幕僚，包括John Ehrlichman（西北太平洋人）、環境品質委員會顧問Russell Train是最支持環境大立法設計以保護美國荒野、水資源以及自然資源的兩個重要推手。

透露出尼克森關於環境立法的重要遺產——包括簽署1970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創建美國環保署，以及隨後支持清淨空氣法、瀕危物種法（1973年）等，都是尼克森本人精密計算希望最大化其政治資本的作法，以爭取跨越兩黨的眾多選民的支持。

但這股力量畢竟沒有持續下去，到底是為什麼？根據作者見解，其轉折出現在1971/1972年的冬天，尼克森開始顯露出遭遇支持產業選民反對的顧慮，擔心繼續支持嚴格的环境立法將會受到反撲。

他曾經親筆寫信給幕僚H.R. Haldeman說：『我感到不安，也許我們做太多了』。他也在1971年2月，寫信給Ehrlichman，提到『就讓我脫離環境議題的麻煩吧』。

尼克森本人對環境議題漸趨冷淡，但他的共和黨同僚卻在國會裡，結合民主黨人，繼續尋找共同的理由，為環境立法而合作，儘管水門案的政治痛楚已經瀰漫整個國家。隨後的繼任的福特，開始面臨能源危機與通膨，再往後的雷根，更以經濟發展為使命，加上更多企業支持成立的智庫等壓力團體出現，將美國帶離這個綠色的榮光，社會也更加分歧。

這本書在字裡行間也突顯了國會之外的眾多環境組織與工作者奮鬥的身影，而那些入與事，也正是團結兩黨的重要社會力量，不分彼此，只為環境。

臺灣尚未出現關於環境立法的「光榮時刻」，卻早已顯露出政治人物害怕衝擊產業的擔憂，綠、藍、白、黃各政黨自顧不暇，即使重中之重的「氣候變遷因應法」，依舊無法凝聚朝野共識，為台灣未來的能源與社會公正轉型擘畫新頁，思之極恐，也極悲哀！

『人』的今與昔

人不是一成不變的，至少從20萬年前的智人開始到今天，『人』的意象與內涵都不一樣。長相、服裝、食物、遊戲、住居、行動等，每個時代都有不一樣的風貌。著名的法國哲學家傅科甚至說過，人是知識的造物，『在十八世紀前，人並不存在』。這是對歷史、對生命、對勞動的深層思考的反思。即使不相信斷裂，也必然不否認今日之我，與以前的人不同，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是不同的。

人本身的連續性並不像表面那樣的有序，但自然在時間的推移下隱藏了差異，人與自然時刻相生，不管是肯定的用語，或者無視的反語，自然漸被疏離，與人的連結斷裂，時間推移不算太長，人總是以局部的、有限的、特殊的「人性」與自然溝通，自然在人的演化中居於副詞的地位，是一個客體支配的關係，更是人的知識系統的化外之域。

以氣候變遷為例，那些抗拒氣候方案、甚至傳播暖化否定論的石化公司老闆，是不是相當於觸犯了危害人類與生態滅絕罪？講出這話所涉及到的『人』與『事』，在過去都是難以描繪之事。有人將載運煤炭的列車與船舶比喻為「死亡列車」，這在過去也是無法想像的。

地球在變，人也在變，什麼時候會連結在一起？尚難斷言。

世界首富馬斯克用440億美金收購推特，有人問他：為什麼不多做慈善？他說：我已經做了很多，開公司是為了人類與文明的未來做好事。

擁有個人基金會是美國億萬富翁標準配備，馬斯克基金會網頁訊息只有短短幾行字

Musk Foundation

Grants are made in support of:

- Renewable energy research and advocacy
- Human space exploration research and advocacy
- Pediatric research
-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ducation
- Development of saf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benefit humanity

馬斯克這位新興的世界首富，據說個人用於慈善方面的捐款遠不及財富的1%，在過往環境類的公益捐款常不及所有捐款的4%，可見這位首富排行榜的新秀，對友善地球的投資應該更低才對。

到底富人（特別是那些世界前1%的富人）是不是應該為地球多做些什麼？寄望富人的慈悲，顯然不切實際。那麼，人的今與昔，富人與窮人的概念及其社會對應（待）是不是也到了應該要調整的階段？

如果傅科所說是可以參考的，也就是人是知識的受造物，那麼，我們到底獲得了什麼樣的知識？以什麼樣的知識對應我們所處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等同於我們如何形塑了我們自己，以及被稱之為人的所有內涵。

你、我是什麼樣的人？怎麼對待富人？弄清楚緣由，是一件重要的事。

佔領華爾街 (Occupy Wall Street)

2011年9月千名示威者湧入美國紐約金融中心華爾街，抗議、佔領以反抗大公司的貪婪不公，社會不平與金錢政治。

示威者認為最富有的1%人們，應該負起更多社會責任，而非略奪、製造其他99%人們的對立與痛苦。佔領華爾街是2008年金融風暴後，民間憤怒的展現。



©大衛·尚克伯恩, CC BY 3.0